

知識天地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淺談明清東亞使節文化書寫

廖肇亨研究員（中國文哲研究所）

歷史有時也會重現，但卻是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在《左傳》一書當中，我們看到春秋時代的各國使節往來，在正式的外交場合賦詩言志，往往成為扭轉國運或歷史走向的決定性時刻。連孔子都說：「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一能夠出使外國，順利完成任務，不負國君託付的使命，就可以算得上夠格的讀書人了。《左傳》當中精巧的睿智、動人的文采，卻在明清時期的東亞諸國的外交舞台重新上演。

明代在朝貢體制確立以後，大致確定東亞諸國外交往來的基本架構。直至晚清中國與世界的外交形態進入世界體系以前，漢詩在東亞各國的往還之間始終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使節的遊記也是彼此觀看的重要史料。例如琉球的歷史與明清兩代的琉球冊封使關係極其密切。即令是晚清大詩人黃遵憲，在近代外交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作品亦同時廣受中國、日本、新加坡諸國讀者的歡迎。中國之外，日本、琉球、朝鮮、越南使節往來之間亦熱中於詩賦創作，例如越南詩人馮克寬與朝鮮詩人李晬光在北京的邂逅與唱和同時其出使中國的記錄，其詩作不僅成為彼此文學史上的佳話，更成為越南與朝鮮詩人追慕的典型。此外，使節的記錄，例如《朝天錄》、《燕行錄》、《使琉球錄》、《越南燕行文獻》等記錄現在也成為談論明清時期的歷史，不容忘卻的重要見證。

在近代以前，異文化的遭遇畢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明清時期東亞諸國往來使節都是學養俱佳的一時之選，對於異國的風土人情、政治風向的體察亦過乎常人。不再只是漫無邊際的神怪想像，或充滿誤解的投射。明代朝鮮對北京紫禁城的印象經常是地板太滑，而中國歷來的文人大夫從來沒有告訴我們紫禁城的地板光滑這件事情。本籍四川的琉球冊封副使，清代中葉的李鼎元在琉球大啖各種海鮮，龍蝦、鮑魚、寒天之後，當地官員隆重獻上具有強烈藥效的當地珍饈海蛇乾，差點昏了過去，停止呼吸，鼓足勇氣，吃了一口之後，他的結論是口感偏柴，淡而無味。著名的《熱河日記》作者朴趾源，從北京到熱河，一路都在看戲，也看到了班禪喇嘛，對於真誠信奉朱子學的朝鮮士大夫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書本上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竟然有這麼大的出入。

相對於詩，使節也見證到其他文類的興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以來，小說的流行盛極一時，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現象。朝鮮通信使足履日本，頗思讀小說解悶。當時負責接待朝鮮通信使的儒者人見竹洞，曾經說當時朝鮮通信使節團副團長公務之餘，希望能夠讀讀小說消閒，特別委託接待人員購買，副團長開出來的書單中有《水滸傳》、《後西遊記》、《玉支機》、《玉嬌梨》、《平山冷燕》、《肉蒲團》、《傳香集》、《夢金苔》、《掀髯談》、《金粉惜》、《催曉夢》、《濟顛全傳》等書。

不過當時並不是使節團長直接下條子，而是透過屬下執行這項有點不好意思的任務，使節想讀小說，必須假下屬之手，因為當時小說仍然難登大雅之堂。雖然這些書今天看來，幾乎都屬於重要的「文化遺產」之類，但在十七世紀，則與今日的《輕小說》或羅曼史系列相去不遠，依然不登大雅之堂，絕非上流社會所應公開談論之事。所以使節團副團長此舉令日本方面接待人員嚇了一跳。朝鮮文人於日本亦可輕易購得白話小說，可以說明十七世紀之時，白話小說已經悄悄進駐東亞知識社群的書桌，或床頭。更有趣的是人見竹洞故意當著朝鮮通信副使的面，悄悄揭露他閱讀小說一事，可以說是日本接待人員刻意踩了一下地雷，人見竹洞接著說副使「時睡起，望之氣宇不快，嘗言多病之人也。於是草草拜謝而退。」副使「氣宇不快」，豈真因為「睡起」。畢竟當時讀小說還是見不得人的事。不過，副使可能不知人見竹洞乃真正經手此事之人，另一方面。小說提供的世界顯然與詩的語言、聲調、修辭都大相逕庭。世界變動，文體亦隨之遞嬗，雖然看似潛流伏行，也已悄然割據一方侯國。

使節畢竟擔負國家使命，絕非吃吃海蛇、看看小說而已，最重要的仍然在傳達國家的使命，不過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喜歡看官腔官調的人畢竟不多，使節們認真撰寫種種章奏疏議的官樣文章固然更近於歷史事實，但卻未必如同種種詩賦流傳久遠。

另一方面，異域流傳也造就了詩人的聲名。晚清的曹弘在《畫月錄》一書當中，曾以十八世紀的中國詩

壇喜與異邦人士交流往來為例，說道：「京朝好名者往往結交聘使，冀其流譽異域，故李莚客有凡詩編流傳他邦者，皆非佳作之論」。詩藝良窳且先不論，外交使節是流傳異域最直接的管道。綜上觀之，東亞各國使節的文化書寫，既是相互觀看的窗口，也是彼此發聲溝通的場域。

使節之詩不單只是風土人情的記錄而已，也反映了（一）「自我 / 他者」的相互觀看（二）不同的價值觀念體系之間的衝撞與融合（三）對國際秩序、社會的實境等不同面向的反映。

同時，我們也發現：對外交使臣而言，旅行的經歷不但是個人難忘的回憶，更是他們社會與知識生活中重要的文化資本。使節的文化書寫（包括詩、小說、遊記、奏議等）不只是單純的旅遊見聞而已，更必須充分傳達背後政權的姿勢與聲調，因此使節留下的記錄既是第一手重要的史料（例如《燕行錄》），從文學的角度看，使節詩學也讓我們重新省思漢語漢文學的作用。如同中世紀歐洲的知識以拉丁文學習溝通，或今天世界各地瘋狂學習英文一樣。漢文漢詩曾經是東亞地區各國知識社群相互溝通最重要的文化形式。

在中國之外的東亞地區，中韓使臣唱和的《皇華集》成為東亞各國漢詩習作的重要範本。在進入近代以前，漢語漢文化也曾是其他語言文化圈知識份子的焦慮、啟發，愛與恨交織的所在。當人們熱切談論梁啟超所受的日本影響時，往往忘記魏源《海國圖志》在稍早的日本啟蒙知識份子（如佐久間象山）流行的情況。使節詩學意味著當時各國使節第一手語文接觸的具體成果，代表漢語漢文漢詩在東亞地區傳播的起點。明清時期東亞使節文化書寫可謂複式聲調的展演，新思惟、新問題，審美角度與言語論述亦可以應運而生，蘊含多重詮釋與重塑的可能性。